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追忆父亲扎根广西农垦60周年

□高庆



▲同甘苦,共患难,相伴60年的父亲和母亲。

六十载弹指一挥间,六十秋追忆一瞬间。农场的山捻花开了一茬又一茬,山捻果结了一茬又一茬,“垦一代”父亲扎根广西农垦60年,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同龄,犹如山捻花的故事一串串,说不完,也道不尽。

2018年6月5日,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父亲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里永存,父亲跌宕起伏的故事铭刻于我的记忆之中,父亲做人做事为真的品格永远鞭策我。

家里至今保存着父亲一张青年时的照片,一米七五的帅小伙,身穿军官服,英俊潇洒,意气风发。晚年的父亲两鬓发白,一张饱经沧桑的脸上爬满了深深的皱纹,深邃的双眼炯炯有神,稍瘦的身躯挺直硬朗,步伐矫健,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脸,总是给人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感觉,不愧是一名老兵,作为他的儿子我深感自豪和骄傲!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父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见证者。父亲历经“北平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父亲一生历经磨难和坎坷,但他不忘初心,永葆革命军人本色,扎根农垦一辈子。

17岁时,父亲参加国民党青年军,属傅作义将军部队;19岁时,在“北平和平解放”后,父亲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心情万分激动;26岁时,父亲成为第一批被授予少尉军衔的军官;28岁时,父亲从广州军区工程兵司令部携妻儿奔赴南国边疆,投身到建设广西农垦的洪流中,垦荒种地,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与八桂儿女默默无闻地耕耘和成长在广袤的田野上;由于不懈的追求,也从不放弃,55岁时的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圆了他久藏心中的梦想;88岁时,父亲离我而去,此时,正值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让我悲痛不已。

1949年·父亲迎来北平和平解放

“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曲家黎锦辉先生一曲《桃花江是美人窝》,使桃花江的美名蜚声海内外。1930年8月,我的父亲高中谷就出生在山水秀美、人杰地灵、人文荟萃、闻名遐迩的湖南省桃江县一个富足的家庭。家里有竹林、稻田,开有碾米、造纸等家庭作坊。由于家庭的变故,家中经营不善,债台高筑,靠变卖家具、东借西凑来维持生活。爷爷奶奶都是读书人,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尽管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依然让父亲读书,这在父亲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1947年7月,国民党青年军到我家征兵。为了摆脱生活困境,减轻家里负担,爷爷奶奶毅然决然支持17岁的父亲参加国民党青年军205师第二期学习班。从未离开过家的父亲便从此到广州黄埔港乘军舰去台湾高雄接受训练,一个人漂泊在外。在台湾高雄的日子里,父亲面临着各种困难和考验需要去克服。我常听父亲说起,当时,由于营养不良,患上了夜盲症,到了天黑,什么也看不见;另一个就是因为水土不服,得了疟疾,身体极度虚弱,仍被要求参加高强度的训练。父亲惶恐和惆怅,面对茫茫大海,人生地不熟,未来的日子如何度过,自己完全不知道,孤独感与恐惧感油然而生。

1948年10月,父亲随师属步兵一、二、三团依序由高雄乘登陆艇出发,于天津塘沽港登陆后转乘火车投向北平。此时,正值国共两党“北平和谈”之时,部队几乎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武器也已封存,游兵散将,各自住在老百姓家中。父亲很迷茫,也很胆怯,经常一个人跑到天安门前呆呆地坐着,焦虑和沮丧时常写在脸上。

在《CCTV国家记忆〈揭秘北平和平解放时,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上摄影队细致周密的拍摄路线〉》中描述,1949年1月14日上午

10点,解放军正式对天津国民党残余守军发起总攻。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解放了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天津解放后,孤守北平的国民党军傅作义部25万人已完全陷于绝境。为了这座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免遭战争破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在90万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的震慑下,在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和北平许多开明人士的敦促下,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接受了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21日,随着《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的签订,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进驻北平城。父亲所属部队奉令开赴指定地点进行改编,光荣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父亲兴高采烈地换上了崭新的军装,精神焕发,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父亲在家时读过高中,有文化,被编入第39军教导团,随部队从北京徒步20多天抵达湖北武昌中南军政大学(前身为抗日军政大学)继续“忆苦思甜”和学习文化。

父亲牢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努力工作,奋发向上的部队教诲,不辱使命,砥砺前行。父亲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党组织的考验。父亲先后被分配到武汉军区工程兵司令部和广州军区工程兵司令部,担任文化教员和器材处助理。1955年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次年,父亲就从中国人民解放军500余万人中脱颖而出,成为37万被授予少尉军衔的军官之一,这在父亲的一生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湖南老家大门上也挂起了“光荣军属”的牌匾,村民都很羡慕,甚感自豪和光荣。父亲婚后不到一年,21岁的母亲也从湖南老家随迁来部队工作,日子过得很惬意,也很幸福!

父亲曾向我说过,他一生体会最深的就是,服从命令,听从安排;工作勤奋努力,做事认真负责以及诚实友善,不要投机取巧,不要占公家便宜。父亲还经常教育我,干任何工作都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持之以恒,没有捷径可言。

1958年·父亲成为垦一代拓荒者

无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立大志。爱岗敬业,淡泊名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报效祖国的农垦精神永远激励父亲勇往直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决策和领导下,以成建制的人民解放军转业官兵为骨干、吸收大批知识分子、支边青年组成农垦大军,奔赴边疆和内地的亘古荒原,开始了大规模垦荒造田、兴办国有农场的创业历程。当时,父亲所在的部队可供选择的转业地方为黑龙江农垦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西农垦。根据记载,1958年广西农垦共接收广州军区2455名军官和3000余名家属,父亲与母亲都在其中。

父亲与众多的“垦一代”响应毛泽东同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等伟大号召,铆足劲头,晴天抢干,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靠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挥洒着汗水,以“人心齐,泰山移”的精神,谱写出一曲曲艰苦创业的赞歌。

时间追溯到60年前,1958年4月,28岁的父亲执行部队命令,放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军人证明书,怀揣一千多元的军龄补助金,背起行囊,领着母亲与100多名同来自广州军区工程兵司令部的军官依依不舍地告别十年火热的军营,奔赴垦宁农场(现为国有广西农垦金光农场),参加地方建设。

父亲说过,当时,怀孕八个多月的母亲也与大家一起乘火车,坐汽车、马车一路颠簸,默默地承受着艰辛,从广州一路前行,奔赴南宁,奔赴农场。从南宁市区到金光农场约60公里,还要连车带人过两个渡口。一路上,两旁杂草丛生,道路弯曲坎坷,大家五味杂陈,忐忑不安,对比机关大院,形成巨大的反差,说得最多的一句:金光!金光!用了大半天时间,大家终于辗转到了金光农场罗阳总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人烟稀少,土地荒凉贫瘠,生活条件极其简陋,百废待兴的场景。住的是用玉米秆围成的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透风漏雨,床边就是生火做饭的地方,乌烟瘴气,加上房间不远处就是马厩,臭气熏天;一桶浑浊的池塘水要经过明矾过滤后,倒出浮在水面上的清水后才能饮用;生活用品需要到几公里外的集市上才能买到。父亲还经常被丘疹、感冒、精神疲惫等症状困扰。每次跟我说起这段往事时,父亲总是百感交集,他也时常提起农场的生活跟部队的生话一样很锻炼人。

最让父亲难以理解的是,到农场的第二天,突然发现所有一起来的转业军官一夜之间都不知去向。可是没过几天,父亲又看见广州军区工程兵司令部又将不辞而别的转业军官送回来,并在农场进行慰问演出后,父亲才明白事情的经过。然而,还是不到一个星期,所有转业军官最终还是各奔东西,杳无音信,这对父亲来说,可谓晴天霹雳。

刚到农场时,父亲按部队的标准每月领取的工资为90多元,不久,农场领导以地方没有那么高的工资为由,要求减掉30元,这一减就是几十年,父亲从没有任何怨言。

再苦、再累、再难,也决不当“逃兵”,靠着对党的事业忠诚和信念,父亲只身留了下来。即将生产的母亲也饱含着泪水默默地注视着父亲,从那一刻起,同甘苦,共患难,他们相伴60年,在八桂大地上养育了我们兄弟三人,将青春、终身和子孙都留在了这片热土上,农场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金光农场以种植水稻、甘蔗为主,从事生产一线的职工为“农工”。在我的印象中,种植水稻是一年两造,在“夏收夏种”的“双抢”季节里,稻田收割后就要马上犁田、插秧。农场以“大会战”“放卫星”“抢红旗”等形式来激励大家“你追我赶,永远争第一”,“干部”“农工”齐上阵,农场职工出生才21天的婴儿就得送到托儿所。其间,还

由托儿所的阿姨送婴儿到田间地头给母亲们哺乳,总之,好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初为“农工”的父亲,依然有军人的本色,当挑起重重的秧苗担子时小跑在田间地头,肩膀磨破了咬紧牙关仍坚持着,腿脚被蚂蚱叮咬也顾不上,经常是凌晨五六点钟天还没亮就出工,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回到家,时常“两头黑”。给甘蔗喷洒农药也是十分辛苦的农活。盛夏的甘蔗地长得又高又密,蔗林里又闷又热,父亲也是和大家一样头戴草帽,肩背农药箱,手握喷雾杆,穿梭在甘蔗地里,身上的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长毛带刺的叶子把裸露的皮肤割得伤痕累累。

父亲总是身先士卒,披星戴月,风雨无阻,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没有任何架子,唯一不同的是父亲身上的军装和标准的普通话以及流利的口才被工友们称为“南下干部的农工”。

母亲晚年常与我说,你爸心地善良,爱家人,性格倔强,不轻易求人;我只是在广州过了两年的好日子,在农场做了20多年的“农工”;你们小时候都是我拖一个,背一个,牵一个带大的,你爸只顾工作;你爸还爱整洁干净,常常把自己归置得很利落,无论居住环境发生什么变化,都收拾得井井有条,这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

父亲勤劳肯干,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在担任服务社主任、商店经理的十多年里,父亲有不吃早餐的习惯,每天早出晚归,自己装车货是常事,白天装车、晚上卸货连轴转,经常是货车回来后,顾不上吃晚饭又与大家一起卸货,100多斤重的酱油桶一扛就走,200多斤的布匹肩上背,实在饿时,就急匆匆地回家喝上几口水薯酒,扒上几口饭或买几块饼干充饥,经常要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回家。第二天,天才蒙蒙亮,父亲就早早起来,用搓衣板洗完衣服,收拾完家后,又到办公室敲打算盘、记账、定价等,准点开门营业后,又帮着站柜台卖货,到处都是父亲忙碌的身影。父亲还练就了一手敲打算盘的绝活,一边不停地抽着“喇叭筒”,眼睛盯着账本,右手指上下飞舞,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既准又快,令大家惊叹不已。我也还记得,每到礼拜天早上,父亲总是要我上门通知其他售货员休息,由他负责顶班,同事都很感激他,这就是我平凡的父亲,一名永不褪色的革命军人。

(下转第32版)